



社会学丛书

The Encounter Between Two Kinds of Action Logic

——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of
Rural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from a Village in Northwest China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

——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考察

郭占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学丛书

The Encounter Between Two Kinds of Action Logic

——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of
Rural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from a Village in Northwest China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

——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考察

郭占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基于一个西北村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会学考察 / 郭占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7-5161-3752-9

I. ①两… II. ①郭… III. ①农村—突发事件—公共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00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邢耀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地扩张和蔓延，各种世界性公共危机频频出现。2003 年“SARS”之后，公共危机管理（public crisis management）不仅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首次成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主要管理领域之一。

毋庸置疑，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面临诸如传统利益格局调整、权力体系重新设置、农村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重组、传统观念嬗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剧烈变化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因而中国进入了危机的频发期。鉴于危机具有紧迫性、危害性、阶段性等诸多特点及当前中国危机高频发生的现实处境，对政府而言，进行及时、妥善而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就极为关键。2005 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2006 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公共危机管理体系。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建立农村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危机处置能力。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完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起到重要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自 2003 年席卷全国的“SARS”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学者不断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中汲取经验，并开始研究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问题，主要从政府预警、应急机制以及政府责任机制这三个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无疑推进了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但是纵观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成果并发现，当前我国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以政府危机管理为中心，以城市公共危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理论路径都是以构建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为主，强调政府的合法性和责任性。

在全球快速步入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谓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过程中，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不仅成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领

域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我国农村发展管理领域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农村如何面对来自全球的风险和危机，这是中国农村发展所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因此，在社会转型之际，基于农业大国以及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的特殊情况，深入而细致地研究风险社会下的农村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表现为五个特点：一是相关研究数量颇少；二是研究内容比较零散；三是经济学视角相对多一些；四是缺乏对某一具体危机事件的系统性、跟踪性研究；五是缺乏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

郭占锋博士在西北地区选取了一个发生过“禽流感”危机的村庄（疫点村），并把危机管理过程分解为危机预警、危机应对（危机识别、危机隔离）和危机恢复三个主要阶段，通过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从而考察在每个阶段，农户与政府各自的行动逻辑，进而剖析这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本书资料翔实，理论框架清晰，文献引用广泛，论据充分，是一篇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上均有创新价值的论文。本书对农民与政府这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以及由于现代化而导致的个体化与应对风险所需要的集体行动之间冲突触及了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本书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郭占锋博士以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和农民的行动逻辑为理论基点去探索转型社会中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范式，并试图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在广泛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以及发展研究等多学科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将其融合以形成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构建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本土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意在从学理上追问两种行动逻辑相偏离的缘由，并尝试从现实处境出发寻求当前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路径。

通过扎实的研究，作者有以下三点重要的发现。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使得农民从传统种植业转向规模化养殖业的过程中，理性的市场交换意识明显增强，出现了农民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个体化倾向，加速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从而使农民在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难以凝聚起“集体行动”的力量。

第二，伴随地方政府的角色逐步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演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更加凸显，进而导致地方

政府出现“代理行为异化”，导致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本位更加突出，继而造成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行动逻辑与农民行动逻辑相偏离，最终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第三，由于以家庭利益本位的农民行动逻辑与以官员个人利益本位的政府行动逻辑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因此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调和的，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两种行动逻辑一旦相遇，就会出现“劣势叠加”效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产生严重影响。

根据上述这几点发现，作者认为要基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培植公共危机管理民间的“反应单位”，使得农民从“旁观者”到“行动者”，重建“乡村共同体”，增强农民的参与能力是当前农村公共危机管理中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要控制地方政府不合理的“自利性”，并监督其代理行为，避免出现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作者倡导从“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转向“危机治理”（Crisis Governance），从而拓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空间。

郭占锋博士认为，在未来农村公共危机管理将会成为一个主流研究话题，而且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无论是在实践层面上还是理论研究层面上都具备可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从“政府—农民”、“历史—现实”、“全球—地方”、“宏观—微观”等结构性对照中可以不断创新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生长点。针对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未来走向，作者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政府和研究者同时要走出“唯自然学科研究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的误区，更要走出单一学科“孤军作战”的区隔困境，并大力提倡人文社会科学参与农村危机管理实践研究，使得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协作以便化解农村公共危机。

第二，在全球风险迭出的时代，考虑到中国的地域广阔、人文地形异常复杂，研究者要转变把政府作为唯一危机应对主体的观念，要关注其能动性长期被忽视的农民这一关键主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作为基层政权代理人的村级基层组织角色和功能。

第三，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要“类型化”和“深入化”，即对某一类型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过程要进行深入研究，包括蹲点研究和跟踪研究，并且要及时总结其发生、演变的规律以及管理经验和教训，以便对下次类似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借鉴。正如哈耶克所说：“尽管历史本身

从来不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序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

第四，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不但要强调本土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路径，更要与国际学术界形成“对话”，以便与发生类似公共危机的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这种学术上的“对话”和“分享”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以上要说明的是，《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一书的价值不限于作者所提出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更在于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这与作者长期对农村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刻体会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不断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才能有永不枯竭的学术灵感和思想火花。当然，限于资料和时间，本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有待以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另外，作为老师，我想说，郭占锋博士跟随我做研究已经六年有余了，他曾经在硕士毕业时放弃了直博的机会，进入一家国际发展机构从事国际农村发展实践研究，并且多次在异国他乡的田野上行走，2009年他赴非洲利比里亚农村进行长达一个月的调研，这些丰富的研究经历对于其现在和以后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支撑作用。郭占锋博士为人正直厚道、做事认真踏实、读书刻苦好思、科研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心智与品性。“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希望郭占锋博士在科学研究这条崎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是为序！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李小龙

2013年6月28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10)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4)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19)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21)
第一节 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	(21)
第二节 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述评	(33)
第三节 中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现状和问题	(39)
第四节 地方政府行动逻辑与农民行动逻辑的相关研究	(45)
第五节 构建中国农村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55)
第三章 和镇营村产业转型与禽流感危机发生	(66)
第一节 和镇：西部养鸡第一镇	(66)
第二节 走进营村	(77)
第三节 营村产业“大转型”：种植业让位于养殖业	(84)
第四节 禽流感危机发生及其影响	(97)
第五节 小结	(104)
第四章 危机的预警：政府的漠视，农民的忽视	(106)
第一节 危机预警与政府的行动	(106)
第二节 危机预警与农民的行动	(122)
第三节 危机预警与两种行动	(127)
第四节 小结	(129)
第五章 危机的应对：政府的支配，农民的被动	(131)

第一节 危机识别与政府的行动	(131)
第二节 危机识别与农民的行动	(143)
第三节 危机隔离与政府的行动	(146)
第四节 危机隔离与农民的行动	(150)
第五节 小结	(157)
第六章 危机的恢复：政府的无视，农民的轻视	(159)
第一节 危机恢复与政府的行动	(160)
第二节 危机恢复与农民的行动	(166)
第三节 危机恢复与社区交往秩序	(173)
第四节 危机恢复与社区学习与反馈机制	(179)
第五节 小结	(181)
第七章 两种行动逻辑的遭遇	(183)
第一节 危机管理与政府行动逻辑	(183)
第二节 危机管理与农民行动逻辑	(189)
第三节 “俱损”：地方政府的官员个人利益本位与 农民的家庭利益本位	(201)
第四节 小结	(206)
第八章 结论和讨论	(207)
第一节 基本结论	(207)
第二节 讨论	(209)
附录	(219)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77)

图表目录

图 2—1	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概念整合框架	(28)
图 2—2	危机管理范围示范	(36)
图 2—3	危机管理阶段示意	(37)
图 2—4	危机管理 4R 模型	(38)
图 2—5	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分类	(41)
图 2—6	本书的分析框架	(60)
图 3—1	1997—2010 年和镇养鸡数量变化	(68)
图 3—2	营村社区	(77)
图 3—3	1996—2010 年营村人口变化	(78)
图 3—4	雍正虎家庭养鸡的数量变化 (1996—2010)	(89)
图 3—5	营村养鸡产业链	(91)
图 5—1	地方政府对疫区划分的心理期望示意	(140)
图 5—2	地方政府与不同机构之间的话语权关系	(142)
图 5—3	园区外养殖农户对疫区划分的心理变化示意	(147)
图 5—4	禽流感危机的疫区划分	(148)
图 5—5	养鸡园区与周边的村庄示意	(148)
图 6—1	和镇养鸡协会组织示意	(180)
图 7—1	政府和农民各自行动逻辑的遭遇界面图示	(204)
表 2—1	公共危机的种类	(30)
表 3—1	和镇各行政村的人口	(66)
表 3—2	1999—2010 年和镇工农业总产值及其养殖业所占 比例的变化	(69)
表 3—3	1978—2004 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中各组成部分比例 以及城乡人口比例	(75)

表 3—4	1978—2008 年中国人均肉蛋奶的消费量	(76)
表 3—5	1996—2010 年营村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变化	(79)
表 3—6	营村主要农作物的季节历	(80)
表 3—7	营村平均农产品成本效益	(85)
表 3—8	1996—2010 年 (15 年) 雍正虎养鸡的收支日记	(87)
表 3—9	鸡粪加工厂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成本收益对比	(94)
表 3—10	禽流感发生前后农户的人均收入	(99)
表 3—11	2006 年营村养殖农户的养鸡规模和损失情况	(100)
表 4—1	2010 年市、县、乡镇三级动物防疫机构兽医工作 仪器设备情况	(113)
表 4—2	W 市沙坡头区村级动物防疫员信息	(117)
表 4—3	1997—2010 年和镇防疫员平均工作量 (家禽类, 主要指鸡)	(118)
表 4—4	2010 年村级防疫员防疫工作量 (牲畜类, 主要 指猪、牛、羊)	(119)
表 5—1	与损失相比, 农户认为补偿多少情况 分析	(152)
表 5—2	营村外出打工人数	(154)
表 6—1	营村 2006—2010 年农户养猪数量	(163)
表 6—2	营村 1996—2011 年打工人数	(166)
表 6—3	营村 2006—2010 年养鸡户数和养殖数量	(167)
表 6—4	禽流感发生前后定期清扫禽舍的农户的 比例变化	(169)
表 6—5	和镇畜牧站对养殖农户所提供的商品蛋鸡免疫程序	(169)
表 6—6	商品肉鸡免疫程序	(170)
表 6—7	陆智龙饲料加工厂赊账的农户偿还情况	(175)

第一章 导 论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左传·襄公十一年》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背景

一 研究缘起

2005 年席卷东南亚的禽流感危机使得中国数十个省份养殖家禽的农户纷纷破产，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鉴于禽流感危机给农户带来严重的影响，2007 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向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申请了名为“禽流感及其控制措施对于亚洲小规模家禽养殖者和庭院家禽养殖者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课题。该课题通过对禽流感及其控制措施对于小规模家禽养殖者和庭院家禽养殖者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在禽流感的控制方面，尤其针对相对脆弱的农户，提出更加可行的禽流感控制战略。该课题周期为两年（2007—2009 年）。本研究课题与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农业社会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ICA-CEPS），越南农业、农村发展部农业农村发展政策和战略协会（IP-SARD）和农业政策中心（CAP），泰国 Chulalongkom 大学动物医学系兽医公共健康部合作进行。

该课题组在宁夏、辽宁、贵州三地选择了十几个村庄作为调查点，主要考察与评估禽流感危机对小规模养殖户的社会经济影响。当然，调查中也提到了政府推动的规模化养殖示范园区，但是这并非课题的研究重点。但是笔者对于政府推动的大规模集中化养殖园区的养殖方式比较在意。宁夏和镇号称“西北第一养殖大镇”，当地农户养鸡历史也比较久远，养鸡数百只以上的庭院养殖也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宁夏和镇的人均耕地不足 1 亩，人地关系紧张，于是养鸡成为绝大多数农户增加家庭

收入的一种途径。农户养鸡的庭院养殖数量逐年攀升,1999年和镇政府建造“第一养鸡示范园”,占地面积168亩,总投资1285万元,建设标准化鸡舍106栋,涉及养殖户35户,存栏蛋鸡13.9万只。政府看到养鸡的经济效益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非常明显,在2003年年底,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和镇政府又建造了“第二养殖园区”,该园区占地500亩,投资3860万元,建设标准化鸡舍330栋,可存栏蛋鸡100万只。2004年和2005年在政府极力动员下,养殖农户陆续入园养殖。可不巧的是,2006年的禽流感危机使得和镇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全镇390万只鸡全部被扑杀,农户的家庭经济、社会生活受到巨大打击,农民20年的原始积累在瞬间失去,和镇一下子从“经济繁荣”走进了“大萧条”。

正是由于和镇养鸡产业的“大起”与“大落”引起了笔者的思考。难道农户要从种植业转向规模化养鸡产业竟然如此困难吗?如此规模的养鸡大镇,政府和养殖农户难道就没有危机预警意识吗?为什么禽流感危机首先发端于养殖园区而不是发端于庭院养殖户?当然,从禽流感危机发现到最后的管理和恢复是一个时间序列,为什么从危机发现到最后全部被扑杀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2006年6—9月)禽流感危机仍然继续肆虐?难道政府和养殖农户都没有作为吗?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乡村的同时,国家防疫技术能力也不断提升,为什么禽流感危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反而会大规模地覆盖全镇性地蔓延呢?当然,笔者更愿意知道养殖农户在这场关乎切身利益的危机管理过程的行动逻辑是什么?与政府的行为相比,他们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同时也考察政府在这场危机管理中的行动逻辑又是什么?这两种行动逻辑有什么差异?这两种行动逻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些疑问不断冲击着笔者的头脑。从2010年6月8日至9月8日的三个月内,笔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W市和镇的一个养殖大村进行田野观察,以期尝试着从田野中寻求对上述疑问的解答。

二 研究背景

近年来,各种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唤醒人们对“危机”的再认识。2003年,“SARS”这一起始于广东佛山市的严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已经蔓延到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

并开始影响到加拿大、美国、印度和欧洲各国在内的全球近 30 个国家^①。截至 2003 年 5 月 20 日,感染“SARS”病毒的全球人数已经达到 8000 人以上,其中中国内地 5248 人,死亡人数 294 人,这还不包括近 2000 例疑似病人。“SARS”从区域性的危机事件迅速演变为影响全球经济、政治和外交的一种重要危机事件。2003 年 11 月暴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在短短两个月时间波及东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病死或捕杀的家禽在 5000 万只以上^②。2004 年年底,震惊全球的印度洋海啸夺去了 30 多万个鲜活的生命。2005 年席卷东亚的禽流感又使得中国数十个省份养殖家禽的农户和企业纷纷破产,造成巨大的经济影响。2008 年 1 月南方雪灾,对大半个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2008 年“5·12”大地震来得更为突然、猛烈,震惊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同时也牵揪着每个人的心。2009 年 8 月台风“莫拉克”给台湾带来了空前的涝灾,村庄淹没,群众流失,造成农林渔牧共约新台币 50 亿元损失。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更是横扫全球几大洲,不仅造成生命的消失,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恐慌。2010 年“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1 年“3·11”日本大地震,这些危机都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

由此可见,在全球范围内,人为与非人为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现代社会时刻面临各种危机和不可预知的风险。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的那样,“现代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③。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之中,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大规模的灾难,也只有那些最为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假定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④。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为 2 亿,占全国人口的约 1/7。70% 以上的大城市、75% 以上的工农生产总值,分布在各类自然灾害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地区,自然灾害的威胁十分严重。同时,我国很多地区自然环境破坏严重,防灾抗灾安全隐患非常多,潜在的危机如同一

① 《追踪非典全国传播链》,《财经报》2003 年 5 月 7 日; Rosenthal, “From China’s Provinces, a Crafty Germ Spread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3. 转引自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② 《卫生部长笑言“中国是安全的”》,《金陵晚报》2003 年 4 月 4 日,转引自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③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2, p. 13.

④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0 页。

个个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发^①。

“危机”这一过去极少被人提及的字眼开始在各个领域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主要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关。按照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 GDP 达到 500—3000 美元的时候，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时期，比较容易导致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从总体上判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发展水平的范畴是“社会形态”。对于同一社会形态中，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水平的判断，则可借用匈牙利学者雅诺什·科尔奈（Kornai）提出的“制度范式”概念。如果以“社会形态”和“制度范式”为基本变量，并分别以纵坐标和横坐标来表示对社会转型进行分类，常见的、现实的社会转型就有三类。一类是保持同一社会形态、同一制度范式的社会转型，可以称之为改良性的社会转型；一类是建构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制度范式的社会转型，可以称之为重建性的社会转型；一类是保持同一社会形态，但选择不同制度范式的社会转型，可以称之为创新性的社会转型^②。依据这种分类，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是创新型的社会转型。这种通过改革、开放所实施的社会转型，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转轨，构建出社会主义更有效率、更为公平和更为民主、更加自由的制度范式，从而从根本上保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也是进行社会危机预警、应对和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郑杭生早在 80 年代末就提出了“转型社会”、“社会转型”、“处于大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社会”等概念和说法，倡导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③。郑杭生教授对“社会转型”的概念表述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

① 陈泽伟、王超群：《我国进入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危期，每年损失 GDP6%》，《瞭望》2005 年 8 月 7 日。

② 参见〔匈〕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潘丽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①。其他学者对“社会转型”内涵的表述也都定位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业—工业”二分范式的转型论^②。进入 21 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在做中国社会研究时特别重视社会转型这一独特背景。沈原（2006）认为，时至今日，未必有人再来质疑转型社会^③。在中国，转型（transformation）概念是在 1992 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1990）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的出版，使经济体制“转型”取代了原有的经济体制“转轨”，成为比较流行，更为通用的概念^④。“社会转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含义：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的急剧转变，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⑤。

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可以说，“社会转型”已经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王雅林，2003）^⑥。曹锦清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出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追赶战略”，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表现了“由观念到实践”的特点^⑦。孙立平认为，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而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也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⑧。其实除这种意识形态

① 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 页。

② 李培林：《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3 年第 10 期；王雅林：《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

④ 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 页。

⑤ 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江苏社会科学研究》2002 年第 6 期。

⑥ 王雅林：《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社会科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⑦ 曹锦清：《理解中国》，《探索与争鸣》2003 年第 2 期。

⑧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的对立外，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依然存在，这两种对立互相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乡村社会转型中的多种力量在相互对立、冲突和融合中共存共生。对于乡村社会转型的现实实践过程，孙立平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正式机构按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运作^①。“变通”也为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条件，这就要求对体制运作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如大众文化、社会网络、民间组织、地方利益表达方式等给予特别的重视。同时，这种“变通”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和机会，使社会学研究不能不关注实践，不能不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是作为国家和民众相遇并互动舞台的日常生活^②。乡村现代化如果从19世纪末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年，其间经历了中华帝国、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当前的改革开放几个时期，围绕两个处境：一方面，国家通过行政建制、新式法律等各种正式制度将自己的权力伸展到社会底层，极大地冲垮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但这种正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并未在乡村深深扎根，也未能完全改变农民固有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残存的社会秩序虽仍是农民行动的重要逻辑基础，但在新的条件下日益显露出多种弊端和不足，无法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的需要。这种两难困境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

郭于华（2006）认为，孙立平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与80年代相比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博弈》是他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三部曲^③，给人们展示当前的社会结构之特性。从文化观念的层面看，曹锦清（2003）认为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社会学的某种意义上是从拥有共同价值观念的群体走向追逐独立利益的个体的过程，社会价值评判从原来政治或权利的身份标准向以财富为标准转移，德无法治理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但这种法律规范与原来乡村社会以共同道德为基础的礼俗社会秩序发生冲突，乡村社会经常处于礼与法相互交锋的状态^④。

① 孙立平：《迈向实践的社会学》，《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② 同上。

③ 郭于华：《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④ 曹锦清：《理解中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2期。